《学术界》(月刊)
总第210期,2015.11
ACADEMICS
No. 11 Nov. 2015

〔域外参考〕

对外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演变规律〔*〕

——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据

○颜　玮[1],姬　超[2]

(1.闽江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2.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　许昌　461000)

〔**摘　要**〕对外开放在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韩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期(1961-1990年)和经济转型期(1991-2011年)的综合比较表明:(1)积极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是韩国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2)水平和垂直双向的国际竞争形势决定了韩国经济起飞时便极其注重提高经济运行效率;(3)世界分工程度的趋缓和国际市场的逐渐饱和推动韩国经济步入转型期,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转而依赖效率前提下的技术创新。

〔**关键词**〕对外开放;经济增长;内涵式增长;经济效率;技术进步

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人们通常认为对外开放和出口替代策略是东南亚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对外开放不仅直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和组织经验以及市场技巧,而且开放式竞争还间接促进了国内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率,正向溢出效应非常明显。但是关于对外开放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动态影响的文献仍然不多,基于这一点,本文重新审视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时的国际、国内背景,认为特殊的国际分工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韩国随后的增长路径,对外开放背景下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压力是韩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经济运行效率则是韩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从而为宏观的经济增长与微观的企业治理两种理论的融合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这也是本文的理论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颜玮(1979—),博士,闽江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金融;姬超(1987—),博士,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增长与转型理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经济特区转型发展的制度研究"(11JJD790050)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与政府扩张的内在机理研究"(15CJL013)研究成果。

一、韩国经济增长的整体过程

韩国与中国、日本同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在文化习俗等社会规范方面韩国与中国儒家传统一脉相承。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韩国缔造的“汉江奇迹”举世瞩目[1]。二战后,韩国各地破坏严重,百废待举。20 世纪 50 年代,韩国各个政党派系之间相互倾轧,政治斗争频繁,经济增长缺乏基本的外部环境。直到朴正熙(1961 年)军事政变之后,韩国政府才将国内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无独有偶,中国也是在建国 30 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才将战略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上来。

在增长特征上,韩国经济与中国一样,都深深的刻上了东亚模式的印记,也都没有遵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路线,而是在威权政治和强势政府主导下走上了经济高速增长道路。20 世纪 60 – 80 年代期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9%,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的奇迹,其增长模式在当时更是成为“东亚模式”的代名词。当然,对东亚模式持反对意见的也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克鲁格曼(2012 年)的批判性反思,克氏认为东南亚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要素投入,同时忽视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率的提升,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大量建立在浮沙之上的 GDP,大规模调整难以避免[2]。一旦资本和劳动要素积累停止,韩国经济也将不可避免的跌下神坛[3]。

但是,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一直持续高速增长,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总是有高潮也有低谷,有快有慢,飞速发展一段时期之后开始减速[4]。韩国自然也不能例外,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韩国进出口开始步入下行区间,贸易赤字大幅增加,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宣告结束。但是依靠发达的教育和科学技术,韩国经济最终还是成功实现了转型,最终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2012 年人均 GDP 达到了 23021 美元(世界银行数据)。

二、韩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

(一)韩国经济的起飞

20 世纪 50 年代初,韩国国内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军事政变不断,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可以迅速成长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强国,且能持续高速增长这么多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政府也曾想振兴民族工业,并且试着通过进口替代战略来解决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但是由于工业基础过于薄弱,加上资源匮乏,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进口替代产业很快遭遇国内市场饱和与国际竞争力低下双重困境,随即引发产品滞销,造成企业开工不足和设备闲置,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整个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5];1961 年朴正熙军政府推翻了张勉政权,韩国就此开始了长达 16 年的军事独裁。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高压反而为韩国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客观上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韩国经济就此开始起飞。

随着国内重心转向经济增长,韩国政府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相继提出了“出口第一”“输出立国”等政策主张,不断强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客观上契合了韩国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是时恰逢世界第一次产业转移,韩国的纤维、轻纺、塑胶、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从而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进入到 70 年代后,世界分工体系进一步深化,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产业重心转移到技术密集型行业,钢铁、机械、电子、金属、化学、水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再次向海外转移,韩国再次适时承接这类产业,产业梯度再创新高。与此同时,韩国政府还将改革视角转向大型企业集团,反思规模式增长和集团化扩张策略,试图通过微观领域的深化改革实现转型目标,进一步提升企业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6]。随着中国等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韩国开始淘汰转移了本国的传统落后产业,一方面将产业发展重点放在精密电子、精细化工、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7],另一方面开始强调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传统优势产业的竞争力,从而使得韩国经济长期延续了强劲增长势头[8]。

(二)对外开放对韩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要素投入是韩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保证,韩国经济起步时,政府大力支持和引导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数量迅速增加,资本形成率从10%迅速上升并逐渐稳定至30%,充分的资本形成能力因而成为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同样的,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很高,甚至超过了韩国;外资引进方面,尽管韩国非常重视引进外资,但韩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比重远远低于中国。另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韩国资本不断寻求海外扩张,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相比之下,中国资本海外扩张的欲望就弱的多。此外,韩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外贸易,逐渐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程度上也将国内经济置于世界经济景气波动的风险当中。上个世纪60、70年代,韩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迅速增加,从20%迅速窜升至80%以上。80年代末期世界贸易形势虽然有所恶化,但是经过短暂调整,韩国产品重获竞争力,进出口贸易总额再度攀升,总体上对外贸易对韩国经济仍然是利大于弊。中国与韩国在这一点上非常相似,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体现的尤为明显,对外贸易对于当地经济起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加入世界市场分工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在贸易产品和贸易类型方面,韩国先后经历了由低级农产品和原料进出口为主的贸易到以工业加工品和技术为主的贸易方式,贸易产品和类型越来越呈现多样化趋势,随之带动了国际间金融、信息、知识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广泛流动,从而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加速增长。

(三)韩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韩国的经济结构也保持了很强的适应性。51年来,韩国农业增加值比重已降至非常低的水平,农业劳动力迅速转移到其它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稳步增长,但容纳的劳动力比重却明显小于增加值比重,表明韩国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较高。第三产业无论在增加值还是承载就业方面都几乎占到一半比重,表明韩国三产化程度较高,而且这一比重仍在稳步提升。此外,韩国的城市化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城市化比重逐渐稳定在80%的水平。反观中国,中西部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仍未结束,整体的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客观上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更长时间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了缓冲期。可以推测,没有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两个重要引擎,韩国经济在90年代不能继续依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增长效应,缺少了这两个重要支撑点,韩国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也就在所难免。但近20年来韩国经济还是成功维持了5%左右的年均增长,所凭借的只能是通过不断转型促进产业内技术进步以进一步释放增长潜能,这一点对于我国极具启示意义,我们不得不思考不同阶段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化增长路径。

根据以上分析,韩国经济增长过程大致包括了以下两个阶段:增长期(1961-1990年),这一阶段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子阶段:6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高速增长期、70年代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和80年代的稳定增长期。这一阶段韩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在于产业结构快速转变以及经济效率提高带来的增长效应;第二阶段为转型调整期(1991-2011年),如前所述,这一阶段韩国经济无法继续之前的增长方式,通过提高经济和企业内部运行效率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增长方式已无潜可挖,韩国政府转而一方面致力于提高本国产业的技术水平以重振出口,另一方面大规模增加海外投资,向

海外市场进行扩张以寻求新的增长点。这也使得韩国经济在经历两次经济危机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长时期的增长实现了韩国经济在质上的进步。

(四)小结

韩国经济开始增长的前十年,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生产潜能都得以释放,特别是劳动要素大量加入到生产性活动,这一时期的劳动增加率显著高于各个阶段。由于这个阶段资本仍然较为短缺,产业形态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而资本对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大量精力投入到如何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的将近一半是由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带来的[9]。

韩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十年,由于前十年的资本积累,这一阶段韩国的主导产业逐渐转变为资本密集型,经济增长更多的依赖资本投入,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大幅下降,随之而来的经济运行效率的趋缓,此时技术进步较技术效率对增长更为重要。

1980 – 1989 年,即韩国经济增长期的最后十年,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开始减少,前十年过多依赖资本的增长方式迅速被扭转,此时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继续提高,特别是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调整保证了该阶段经济的继续增长。

进入到转型期后,韩国经济增长继续减速,但较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仍然保持了很高的增速。韩国的经济转型也并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即经济增长开始更多的依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不再继续依赖高投入的粗放式增长。结果表明,尽管转型期韩国的要素投入增长都开始下降,但其贡献却不降反增,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重新上升到 60% 以上的水平,劳动要素的贡献率也迅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反而趋于稳定,甚至有所下降,其中技术进步较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更加关键,特别是进入到 21 世纪以来。这就表明,由于此前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强调,韩国在经济转型时更加注重要素质量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内生性技术进步。

三、韩国经济增长过程对中国的启示

(一)韩国经济增长过程的总体启示

第一,总体而言,对外开放在韩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却并不影响“内涵式增长”增长路径的形成。尽管韩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投入增长率一直较高,但仍然保持在较合理的区间水平。在经济增长阶段,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期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增长期,韩国人在经济还未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始终非常注重经济内部运行效率的改善,强调企业这一经济组成的微观基础的效率提升,以获得高效率的经济增长。

第二,随着世界分工程度的趋缓和国际市场逐渐饱和,韩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的下降了,推动韩国经济进入转型期。这一阶段韩国才开始重点关注资本和劳动要素质量的提高,开始注重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和提高创新水平,增加产品的知识含量,以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以上构成了韩国独特的经济增长和转型路径,即由内到外、由微观到宏观,先改善经济运行效率再注重技术进步的增长方式,这显然与我国以开放促改革,从宏观到微观,由上至下的增长模式存在很大差别,从而导致了两国不同的增长绩效。本文并不先验的对两种模式孰优孰劣给予定论,但却有必要思考造成两种不同增长路径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两种增长模式都使得两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了两种增长模式各自的合理性。两国的增长经验显示了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竞争体系中不断提高产品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斯密式内生增长。进一

步的,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表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增长的主要动力存在差别。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继续以往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行不通,尽管与韩国相比,中国腹地更为广阔,区域发展也更加不平衡,这使得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通过产业转移和再调整进一步释放增长动力的可能性,但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转型越来越面临空心化困境,传统落后的产业转移出去之后新兴高技术产业并没有如设想中那样蓬勃发展,一方面新兴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有限,另一方面也导致国内产业体系陷入低水平的恶性循环,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从而限制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转型。

这种结构性问题最主要的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与韩国相比,我国整体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合理现象,产业间和产业内都存在协调难题,部门之间的互补性不足;第二是需求结构扭曲问题,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需和投资的增加,内需严重不足;第三是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体现为粗放式增长,增长依靠粗放的要素投入——土地、劳动和资金的投入。三个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互相交织,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经济转型的难度,增长初期忽略的问题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和着力点仍然在于深化改革,重新激发改革活力,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在扩大开放领域的同时深入到企业运行机制,从经济基础上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内部治理水平,在此前提下以企业为主导将资源配置到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环节,实现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转型。

(二)韩国经济增长过程的路径启示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不得不在面临国内外双向竞争的背景下,争取进一步深化分工格局,一方面在更高价值环节获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要扩大市场规模,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对于我国经济的未来增长,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有机部分:

1. 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向增长的“长度”和“质量”转型

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继续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已经很难实现,区域竞争主题将由增长的“速度”和“总量”转换成“长度”和“质量”之间的竞争。因此,如何尽可能长时间的维持中等速度的增长将成为新的常态,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考虑世界其他赶超型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情况,我国当前的增长速度仍然是相当高的。例如日本在战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即 1955 – 1973 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 8.89%,1975 – 1990 年间年均增速降为 4.29%;韩国的情况与之类似,韩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高速增长,特别是在 70 年代期间年均增长 25%,进入到 90 年代后逐渐开始减速,年均增长率降低了近 10 个百分点,但是仍然保持年均 6% 的增长率,从而保证韩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能够继续提高,避免了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尽管我国当前增长速度有所降低,只要能够维持足够长时间的增长,我国也必定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我国经济的未来就不再是继续通过要素驱动维持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是在日益紧张的资源约束条件下,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尽可能长时间的增长,哪怕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例如 5% – 6% 左右的新常态,即从追求“速度”和“总量”的增长方式逐渐转向追求“长度”和“质量”的增长方式。

2. 从“以开放促改革”向“以改革促开放”转型

从转型的方向来看,韩国并不能先验的成为我国未来转型的模板,中国经济存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对于中国,更为现实可行的转型方向在于“由外到内”向“由内到外”的转变,即从“以开放促改革”向“以改革促开放”的思路转变,轻率的否定外向型经济方式在当前并不可行,我国在短时期内迅速转型为内向型增长方式并不现实。在当前外贸形势不断恶化的背

景下,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很难持续下去,我国必须以全新的姿态加入到世界分工体系中,改变传统的生产、加工、制造等低端位置,在更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等环节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外向型增长方式。

3. 投资的"数量"向投资的"主体"和"流向"转型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意味着简单减少要素投入,经济持续增长依靠的是要素质量的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以及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单纯减少要素投入不但无法实现经济转型,反而可能恶化经济增长。因此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需要反思的不是投资本身,而是投资的主体和投资的流向,通过投资主体和投资流向的改变,继续提高投资效率,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投入生产要素,继续维持一定水平和一定时间的经济稳定增长,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4. 从技术革新的"速度"和"高度"向技术革新的"强度"转型

对于我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言,制约瓶颈并不是可以应用的技术的缺乏,而是对技术应用本身的限制。为了实现"斯密式内生增长",我国必须在实践中强调对原有技术的更好采纳,强调技术边界循序渐进的外移。当经济和技术层次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继续依靠重要的技术突破维持长期的增长并不现实,更为可行的方法在于通过激励广大部门的组织方式更新,将经济体系的专业化推向新的高度,从而增强整个经济体系的技术强度。在此基础上形成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保证新的技术突破的适应性,而不是盲目的追求技术的高度。

在转型过程中,韩国在增长初期对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更高、更新技术的追求程度,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转而关注技术研发。我国恰恰相反,各个地区不顾自身发展程度盲目追求高新技术。然而,外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进步并不能很好(或者高效)的带动经济增长,外生性技术进步不但可能与当地资源禀赋不相协调,反而可能因为资源错误配置导致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就提示各地重新反思以往的增长策略,进一步的增长只能依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将改革触角伸向更加微观的企业中去,致力于提高经济基础单位的运行效率,在此基础上提高技术研发力度和创新水平,形成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实现要素的高效、合理配置。

注释:

〔1〕金承权:《岔路口上的韩国经济与金泳三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国外社会科学》1994 年第 4 期,第 26 – 31 页。

〔2〕保罗 ·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12 年。

〔3〕Alwyn Young. Gold into Base Meta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2003.

〔4〕张晓晶:《增长放缓不是"狼来了":中国未来增长前景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 4 期,第 51 – 62 页。

〔5〕朱灏:《韩国经济的复苏及其启示》,《亚太经济》2007 年第 5 期,第 85 – 89 页。

〔6〕丁溪:《从大宇集团的破产看韩国经济》,《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 年第 4 期,第 36 – 39 页。

〔7〕刘永波:《经济全球化与韩国经济腾飞——韩国现代化成因浅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第 98 – 101 页。

〔8〕彭金荣:《韩国经济再现"江汉奇迹"的原因和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 年第 6 期,第 89 – 94 页。

〔9〕姬超:《韩国经济增长与转型过程及其启示:1961 – 2011》,《国际经贸探索》2013 年第 12 期,第 45 – 60 页。

〔责任编辑:徐　子〕